

给传道人的一些有关希腊新约文本圣经的注释

少数人的观点

摘要：目前有将近 6000 份现存的有关希腊新约文本圣经的有文字缺失或完整的抄本。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在过去抄写抄本的过程当中，人们除去错误，同时组建并产生了新的手抄本，然后体现在了这些抄本当中，这种融合文本形式被称为拜占庭式文本。但是，我们应该根据一个确定的原则，重现完全相同的（或至少非常接近的）原始文本。因此，我们试图通过经文鉴别学的主要方法，展示出完美的圣经文本。拜占庭式文本被教会广为流传了好几个世纪，按照常理推测，这个文本应该得到现今的地位，但这并不是通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得出的结论，而是由于一些历史因素或因为流传的比较完整而有所殊荣。

注释：下面的一些想法是作者的最初想法。他想主要通过简化或重述的方法，帮助非专业人士更多地了解其他人的想法。文章中标有斜体字的专业术语，在论文的末尾部分给出了定义。在文本中出现的所有不确定的引证都摘自于“莫里斯 A. 罗宾逊（Maurice A. Robinson）”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拜占庭式文本，2005》（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Byzantine Textform, 2005）当中。

简介：纸张、油墨和字体

1. 所有的事情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在这个特别的时代，书面交流是最真实的沟通方式：个人电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打印机（1874 年）、甚至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十五世纪四十年代）都不存在。文件是被手写出来的，无论是个人信件、笔记还是官方法令。如果需要多个副本的时候，额外的抄本只能一次完成一个。

2. 在新约个别书卷写作的时代，最流行的纸张是**蒲草纸**（大约出现在公元前 2400 年），经常被放到比较长的卷轴当中。墨是由不同的物质制成，一般是**灯炭黑**；笔是用锋利的芦苇制成的，之后出现了鹅毛笔。动物的皮（**牛皮纸**、**羊皮纸**）也被用于写作的材料（大概出现在公元前 1468 年）。动物的皮在使用上有个优势，就是可以保存的更久远。缺点就是价格不菲。而今天被我们所熟知的纸张，是由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公元 795 年）从纸张的发源地中国所引入欧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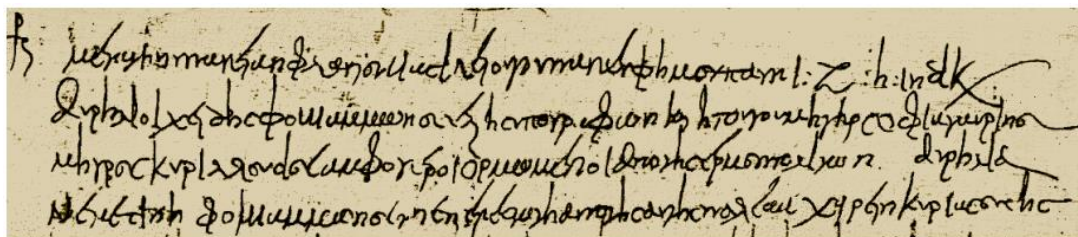
3. 我们不能确定最初的新约圣经是用什么材料写成的，因为很明显**原稿**（最初的文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然而，现今对我们来说几乎所有的有价值的新约圣经**抄本**，都被发现于公元四世纪以前的蒲草纸上。而几乎所有的从 4 世纪到 14 世纪**现存至今**的手稿，都被写在羊皮纸上。早期的新约圣经手稿可以被写在卷轴的版式上，但是我们现存的证据表明，这种版式是最早期被规范传播的，拷贝的另一种版式——**书**，出现了，也就是**古抄本**，那时候的书有了真正的页，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沿着纸张的边缘被绑在了一起。

4. 最早的希腊文字是以**安色尔字体**的版式呈现的，跟我们现在的大写字母没有太大区别。**草书**是由安色尔字体转变而来的，就像现在的草书和小写的印刷体很自然的出现在著作当中一样。无论是安色尔字体还是草书都被人们使用在日常的文件当中，并流传了好几个世纪。所有 10 世纪之前被写成的手稿仍然存在，这为我们考证安色尔文字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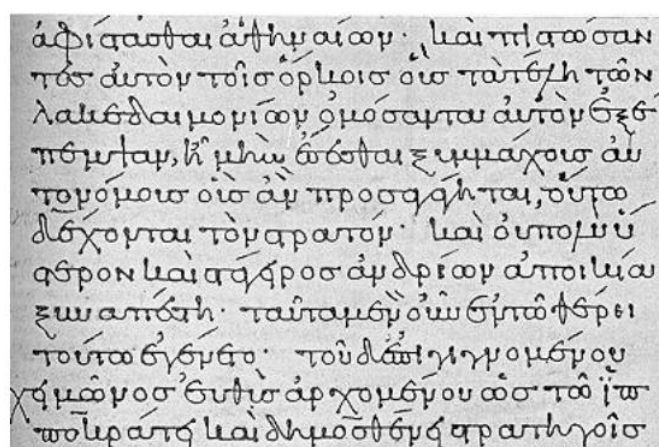
5. 在 9 世纪早期一种被称作小楷体的版式出现并流传开来，特别是对抄写员来说，他们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效率提高了，并且书写速度也加快了。这种字体是在草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书写更正式了。在 10 世纪末的时候，所有的经文抄本（除了经课集）都被写成了小楷的形式。



(1) 安色尔字体：希腊手稿，4 世纪，安色尔字体。西奈山抄本，（莱比锡，皇家图书馆）。经文：《圣经》，以斯帖书 1:20-21(摘自于维基百科)



(2) 草书：古代的希腊草书手稿，写在蒲草纸上的，日期是公元 545 年，英国博物馆，蒲草纸第 1319 号。正文：债券（私人合同）。(摘自于维基百科)



(3) 小楷：希腊手稿，最早期的的小楷体（最早的抄本），10 世纪（佛罗伦萨，劳伦森

图书馆，普鲁塔克，69)。正文：修西得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四本书，章节：88-89。
(摘自于维基百科)

GREEK SCRIPTS OF THE MIDDLE AGES

CAPITALS	UNCIALS	CURSIVE	CURSIVE MINUSCULES
Α	ΑΑΑ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ΒΒΒ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Γ	ΓΓΓ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Δ	ΔΔΔ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Ε	ΕΕΕ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Ζ	ΖΖΖΖ	Ζ ζ ζ ζ	ζ ζ ζ ζ
Η	ΗΗΗΗ	Η η η η	η η η η
Θ	ΘΘΘ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Ι	ΙΙΙΙ	Ι ι ι ι	ι ι ι ι
Κ	ΚΚΚ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Λ	ΛΛΛΛ	Λ λ λ λ	λ λ λ λ
Μ	ΜΜΜΜ	Μ μ μ μ	μ μ μ μ
Ν	ΝΝΝΝ	Ν ν ν ν	ν ν ν ν
Ξ	ΞΞΞΞ	Ξ ξ ξ ξ	ξ ξ ξ ξ
Ο	ΟΟΟΟ	Ο ο ο ο	ο ο ο ο
Π	ΠΠΠΠ	Π π π π	π π π π
Ρ	ΡΡΡΡ	Ρ ρ ρ ρ	ρ ρ ρ ρ
Σ	ΣΣΣΣ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Τ	ΤΤΤΤ	Τ τ τ τ	τ τ τ τ
Υ	ΥΥΥΥ	Υ υ υ υ	υ υ υ υ
Φ	ΦΦ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Χ	ΧΧΧ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Ψ	ΨΨΨ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Ω	ΩΩΩ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4) 中世纪的希腊手稿样本，摘自于费城斯坦利·威姆斯 (Stanley Wemyss) 所著的《最初书写圣经的语言》(《The Languages of the word》) 一书的第 80 页。(1950 年)

6. 这样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可以推断，初期的独立的新约圣经书写完成之后，至少有一份副本被保留了下来或寄给了他人。同每天练习一样，作者们通常会制造或保留另一个书写副本，可能是完成稿的草案。大部分的新约圣经书写后被寄给了个人或个别的教堂；另一些新约圣经（如：彼得书信）的完成是为了在一大批读者当中广泛流传的。

7. 在任何情况下，新约圣经的 *正典* 都被认为是神的话语，因此是有价值的，而副本是在正典被写完之后不久制造出来的。一些我们已知的，是由教堂的神父告诉我们的；其他一些是推断出来的。最终有很多副本流通了。在经过了一段未知的时间之后，手稿显然不存在了。

8. 通过各种手段，经文通过不断扩大的范围在被抄写传播。今天还有将近 6000 份文字缺失或完整的希腊新约圣经抄本存在。我们可以假定，几个世纪以来至少有相同数量或更多的其他副本被抄写出来，但是由于某种原因都被毁掉了。在 16 世纪，希腊新约圣经第一次印刷出版 (1516) 之后，手工抄写抄本就停止了。

现今新约现存的抄本

9. 如果我们看现存的抄本，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参照下面的章节“为什

么抄本之间存在着不同”)他们看似被分为了四个独立且相关联的群组,通常术语称为经文类别。第一种叫做西方式。经文的特色是抄写者喜好改写:字、字句,甚至整个句子都任意改变、增删,只要修改者认为那样作,可以使经文更有力而肯定些。有少数一些手稿跟这种类型的文本形式是很相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伯撒抄本(D/05)。(为了方便参考,手稿被用阿拉伯数字或数字及大写字母[拉丁文,希腊文还有就是希伯来文]的混编分类。)

10. 第二种经文类别被称作亚历山大式。如果仅从它与早期手稿的关系来看,它是很重要的。尽管它的支持者们可能否认这一点。它以校订为特点,看似是正确的。的确如此,拜占庭人认为它是其他手稿校订时的优先理论,很可能是更改时的修订本或西方式文稿的附件。最著名的经文类别是西乃抄本(aleph)和梵谛岗抄本(B),这两个抄本都从公元 200 年的某段时间开始的,并以保存的完好的一打蒲草纸的形式发现于 4 世纪。像任何一种经文类别一样,亚历山大式也是不统一的,的确,仅在四福音书中,两种主要的抄本之间就出现了 3000 处以上的差别。

11. 凯撒式,尽管有足够的理由被这样称呼,但通常这种文本都不被假想为原稿的映射。人们宁愿相信它是出现在大量的拜占庭式经文或亚历山大式经文当中的。

12. 拜占庭式经文反映出了许多的数据,被写于大量的抄本当中,被很多变体读物所支持,被发现在早期的翻译当中并被早期教堂的神父所评论过。大约 95%的希腊抄本新约圣经当中包含了拜占庭式经文。这种抄本是以主要讲希腊语的地区为中心的,其中包括意大利南部、希腊和大部分的土耳其地区,从 4 世纪开始直到印刷术的出现。(笔记流传的这一地区,也正是基督时代初期拥有新约圣经原始稿最多的地区)。这一地域上的证据在 4 世纪之前是缺乏或不完整的。这一项我们将在下面标注的反对拜占庭式经文优先的模块中讨论。

为什么抄本之间存在着不同

13. 如果我们假设只有一种原始稿圣经,那么为什么又会在根本上存在那么多的不同呢,而且为什么又会有四种独立的经文类别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复制的过程导致了副本与样本产生了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抄本被复制了。有两个主要的变化类型。首先,是由于抄写员的疏忽而导致的错误。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也阐述了抄写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错误。即使一个抄写员很仔细的抄写,尽量保证与被抄写的文件保持一致,但他也去除了在他抄写之前文件中存在的错误。话虽这样说,但抄写员本身也是良莠不齐的。有的细心些,可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或是很有天赋;也不乏一些很粗心的抄写员存在。那么即便新约圣经的抄写员都是非常细心的这一类,他们仍然避免不了会在抄写的过程中犯一些疏忽上的错误。

14.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在完全相同的两段经文当中怎么会出现不同的文字,我们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为例(以国际新标准圣经为参照):

If I speak in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only a resounding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can fathom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ve a faith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nothing. If I give all I possess to the poor and surrender my body to the flames, but have not love, I gain nothing.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But where there are prophecies, they will cease; where there are tongues, they will be stilled; where there is knowledge, it will pass away.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perfection comes, the imperfect disappears. When I was a child, I talked like a child, I thought like a child,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childish ways behind me. Now we see but a poor reflection;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And now these three remain: faith, hope and lov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If I speak in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only a resounding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can fathom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ve a faith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nothing. If I give all I possess to the poor and surrender my body that I may boast, but have not love, I gain nothing.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pompous,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But where there are prophecies, they will cease; where there are tongues, they will be stilled; where there is knowledge, it will pass away. Now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perfection comes, the imperfect disappears. When I was a child, I talked like a child, I thought like a child,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childish ways behind me. Now we see but a poor reflection;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And now these three remain: faith, hope and lov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我们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共有三处划线部分：第一处，左边的译为“到火焰当中”，右边的译为“或许我夸口了”；第二处，左边的译为“粗鲁的，狂暴的”，右边的译为“自大的，浮夸的”；第三处，左边的译为“因为”，右边的译为“现在”。中文圣经也是如此。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注：“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让人夸赞**，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因为我们知道的只是局限的**，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注：“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在前面我们看到的经文，左边一栏里的是和合本圣经，右边一栏中除了划线部分的三处，

其他部分完全相同。

15. 如果你怀疑抄写员是否在抄写过程中真的这么容易犯错误，那么你可以自己尝试抄写几章新约圣经的经文试一试。然后回去检查一下你努力抄写的经文与原文之间的是否存在差别。你或许还可以尝试一下按照希腊版（或者其他任何一种你不精通的语言）圣经抄写几个同样的章节。当你以一种你不擅长的语言抄写经文的时候，错误的发生率将大幅度提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漫长的几个世纪当中，很多的抄写员对希腊文都不是很精通。

16. 第二种类型的错误，是因为故意修改而产生的。这种类型，从逻辑上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刻意地努力纠正错误（不管是真的有错，还是感觉经文中存在错误）引入了先前复制过的抄本。假设，这种修改经文中因拷贝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种情况是很容易被证明的）的行为是正确的，又或许在整个过程中改良了原始经文中出现的粗糙的表达方式（这种情况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很难被证明）。第二，故意修改了拷贝的过程，其中包括：协调，宗教的“改进”或是教义的变更。

17. 协调的内容，特别是在符类福音书当中，与其说是去写一段被给出的文字，倒不如说是写一段众所周知的文字。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无论在福音书的任何段落中出现相同的文字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认为这是变化的。所以，当在两种不同的经文类别中出现分歧的时候，人们一定会用这二者，去和已存在的福音书作对比。我们不应该机械的跳到结论，认为与原有的经文相同的是原稿而另一种是试图与之协调的内容。宗教的“改进”是增加经文并使人们看了以后更加虔诚的过程。例如：一个抄写员简单地增加了一个“主”字，就包含了“耶稣基督”。最后，教义的改变就是改变了一下说法，称呼，调整了一下经文的顺序，从而使之阅读起来更多的支持某种特殊的教义。

18. 在我们继续以前，要强调的是，通过总结现有成千上万的新约抄本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在抄本经文中可以看到有 94%或更多的相同之处。因为只有一个原稿，事实很多副本都不相同，那就意味着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抄写错误。文本考证的主要任务是从抄写的副本上来判断原文是什么样子的，所有显示不同的地方，其中大部分源于抄写的错误。

两种主要的经文类别

19. 今天有两个主要新约圣经文本的思想派别。一种思想派别我们可以叫做拜占庭优先派，也就是这些大量的来自于新约圣经抄本的经文更像是代表着原稿的。另一种学派我们把它叫做折衷方法派，就是根据一些相关的原则，以其中的任意一种经文为基础，做挑选或选择。实际上，折衷方法派已占据了新约圣经经文考证世界的主导地位，并且延续了半个世纪左右。严重的倾向于亚历山大式抄本。在本文中所提到的“亚历山大式”和“折衷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尽管他们都具有各自本身的语义。

20. 拜占庭式经文经常被人没由来的污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被贬低的所谓公认经文相一致。（公认经文是无可否认的拜占庭式文本的一个可怜的代表。事实上公认经文和今天的拜占庭式文本形式在整个新约圣经部分就存在 1800 多出不同。这么多的不同已经足够去用其中一个去批评另一个了。）除了那些不相干的反对意见，拜占庭式经文是具有实际价值的。那些挑毛病的至少在从 4 世纪到印刷术的发明这一期间，通过流传的经文说出了它的起源、出现和优势。实际上，按理论讲可见的事实是最好的结论，拜占庭式的批评者们在历史演变

的过程中通过流传的经文反而由他们自己指出了它的优势。

21. 目前，反对意见的增加并不是建于真的缺乏最好的经文的基础上的，而是因为某些个人因素去反对拜占庭式经文，其中包含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由韦斯科特（Westcott）和霍特（Hort）在 125 年前的某一时间提出来的。他们提出，在 4 世纪后半段，拜占庭式经文作为一个关键的修订本出现了，或许是由于某个教会的同工会委托，当地的某些教堂支持，从而不断扩大了影响，并普及，以至于被人们所接受。这种解释的问题就在于它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第二种反对意见（也是今天更时尚的说法），假设拜占庭式经文是一个加工的结果，但是我们发现建议的细节是粗略的，不足以解释这些资料。这两种反对意见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早期（4 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式经文抄本。这个事实离证明或反对任何一种经文类别都很远。记住，我们只有 4 世纪早期任何类型的抄本当中的极少部分，其中只有一种抄本（第 75 蒲草纸抄本）是非常详细的经文类别（亚历山大式）。

22. 这有一个比喻：假设在堪萨斯州的一个特定的县，我们调查办公室职员身后房间里的旧档案。我们发现将近 6000 份狩猎单据。其中绝大部分是猎鹿的，只有少数的几百份是打鹌鹑的。几乎所有这些单据的日期都写的是 1950 年以后的。只有房间角落里发现的一小部分是 1950 年以前的——很明显这些年深日久的旧档案绝大部分已经被抛弃了。数据表明，在 1950 年以前，没有猎鹿的执照，其中一些是狩猎执照，一小部分是打鹌鹑的执照。根据推理，“这个县在 1950 年以前没有发行猎鹿执照吗？”当然不是。大部分 1950 年以前的档案都已经不存在了，而剩下的这一小部分已经不能构成证据了。正如 1950 年以前的猎鹿执照一样，很多旧的证据已经不存在，或无效了。事实上，按照逻辑推断，猎鹿或许比打鹌鹑远远要早，甚至比 1950 年要早很久。

23. 或许赞同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去理解：拜占庭文本的地位事实上是原稿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拜占庭优先理论），是被经文评论家们认为最直接以至于最简单的想法。相反，对于有争议的部分，抄本当中发现的资料解释要远比亚历山大文本的拥护者们给出的解释简化得多。

24. 另一种文本形式是亚历山大式文本。不像拜占庭式文本的抄本那样，被发现于爱琴海附近以希腊语为母语的国家当中，并流传了几个世纪。亚历山大式文本主要源自基督徒时代的早期，是以古埃及的双语（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手稿形式描写出来的。

25. 没有一种单独的抄本可以充分地代表一种单独的文本形式——无论是拜占庭式的，还是亚历山大式的。因此，应该有证据表明一种现存抄本的评价是建立在一些理论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拜占庭式还是亚历山大式的文本形式，一定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理论去促使人们做出选择，选择哪一个文本形式才最能代表原稿。支持拜占庭式文本的理论大体上可以从文本是如何被拷贝和分部的（传播的历史）开始追溯。在任何一种观点当中，这些考虑都被给予了优先权和仔细衡量的地位。综上所述，外部资源的资料被评价了，最终内部的因素被权衡了。如果在变体读物当中发现了任何一点，那么这个理论将被应用于在诸多变体当中做出选择，从而来确定哪个变体更接近原稿。

用折衷的方法来恢复原始经文

26.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抄本优先的理论是基于人们选择了对较早期的抄本的偏爱，因为这

些抄本当中分享了一些少数抄本（亚历山大式）当中存在的许多共同点。其倡导者，真的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字传播理论去支持他们的决定。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党派支持的经文是源自亚历山大抄本当中的，而不喜欢的源自于拜占庭抄本当中的。特别是学者们实行的折衷的方法通常是源自这两种争论，从而证实了他们为什么喜欢亚历山大抄本：1）亚历山大抄本主要来自于基督徒时代的早期，因此，更接近于原始手稿——这一假设对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就是，越早期的抄本就越具有原始手稿代表性。2）同时，这些学者们钟爱亚历山大抄本是因为他们假定了大量的拜占庭抄本，是由专业的抄写员们不经意的疏忽，官方的篡改而制造出来的，供某些教会使用的，杂乱经文拼凑而成的版本。这两种观点在下面将被解决。

27. 此外，亚历山大式的拥护者们看似早早地假设了许多荒谬的语言来偷换概念，以至于跟任何的单独抄本之间都不存在联系。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或抄本幸存下来，可以有权威性的用于引导他们的决定。恰恰相反，被他们称之为残存碎片的东西，彼此之间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加工文本的方法，使文本中很多不同的地方在任何一个现存的抄本当中都不具备代表性了。

28. 在折衷方法的世界里，我们仍然依靠的是经文评论家的智慧和技能。编辑委员会的决定几乎被认为是最终的决定。据亚历山大式的创始人们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条理论基础去决定哪一个才是原始经文；最终决定权取决于我们自己。分析本身决定了什么才是原始理论。无数个年代的抄写员和读者们见证了，从原稿到现在的版本很明显是打了折扣的。仔细地考虑一下吧，看看结果到底有多糟糕。

29. 一段在希腊新约圣经中给出的经文，假设两种相互矛盾的变体经文被鉴定为 A 和 B。原稿不是 A 和 B，是 A 或 B（或是一些其他的读物）。经文 A 被抄本 a, b, c, d, e, f, 所支持，然而经文 B 被抄本 g, h, i, j, k, l, 所支持。在同一段章节当中，还有另一组被比较的经文 X 和 Y，分别被抄本 k, l, m, n, o, p 和 a, b, g, h, s, t 所支持。我们商议和讨论过后得出结论经文 A 和 X 是最初的手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被推断出来的原稿吗？另外，这就是我们决定原始经文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只是制造出了一段不仅仅存在于一个单独的现存抄本当中的经文。

30. 为了强调这一明显特点，我们给出了一下类比：假设有五个人各抄写了同一张有二十个条目的单子。现在原始的单子已经找不到了，我们想要根据这五张单子还原最初的那份。A, B, C 三个人持有的单子是完全相同的。D 手中的那一份跟 A, B, C 三个人的单子有一个条目是不同的，我们假设是第 12 条。E 手中的那一份也有一个条目跟 A, B, C 三人的不同，但是第 18 条。折衷方法可能会给出这样的一份单子，第 12 条来自于 D，第 18 条来自于 E，其他的条目来自于五个人相同的条目。但事实上，折衷的方法重建的单据是不同于任何一个现存的单据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原始读物能说明什么呢？

31. 我们通过在众多经文中选择，得出了这样一段经文（在第 29 段中提到的）。它通过组合得出来的，并且阅读起来很连贯。但对我们来说，它并没有存在于任何有价值的抄本当中。正因为这个简单的因素，支持 A 和 X 的抄本分别具有各自独立的一套体系——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抄本同时包含着读物 A 和 X。该委员会认为这条经文是一种假设的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原始抄本读物与近 20 个世纪任何一个读者所亲眼见到的这段经文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关于其他的逻辑上可能产生的读物，即 AY, BX 和 BY，每一

种至少有两个我们认为合成的抄本所支持。

32. 现在我们用真实的资料来阐述这个观点。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五章二节里有两处变体经文存在于现有的抄本当中。首先，大概有七处经文反映出了这个短语的不同排列“在羊门里/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其次，有六种不同的说法来表达地名：贝尔士大、毕赛斯大、毕赛大、百德赛大、百德赛丹、毕士大（Belzetha, Bethesda, Bethsaida, Bedsaida, Bedsaidan, Bethzatha）。折衷的方法把它组合之后并连贯的读出来就变成了这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问题在于这决定了他们的第一次阅读，顺便遵循了拜占庭式的文本，他们遵循了一组抄本，并见证了这些抄本之间存在着对立性，这样也支持了他们第二次阅读的选择，毕士大（Bethzatha）。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组合出来的经文并没有存在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现存的抄本当中。拜占庭式，另一方面，可以读作“在耶路撒冷的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经文是这样的。因为他出现在了許多现存的抄本当中，并且经文在历史和传播方面的完整性。

33. 令人震惊的是，在现在折衷的希腊新约圣经当中，存在着至少 105 段独立的经文。正如我们上面举例选择的经文 AX，是很明确地没有被任何形式的抄本所支持的。因此，这些经文就成为了“人为的”。当两段连贯的经文被鉴定了之后——跟着就是第三段——之后的结果就会变成“没有证据支持的抄本”将继续膨胀——并且以几何基数增长！（有 315 处经文是由两个不同的版本拼成的。）悲哀的结论是，占主导地位的亚历山大式经文是由折衷的方法制造出来，并被发现印刷在现今的希腊文本当中。但这一版本的经文在基督徒时代的历史阶段并不存在任何的读者。也就是说“最具现在折衷版本的经文在历史传播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被证明，原稿或声称最接近的，也没有现存的抄本可以去证明这一点，*翻译的资料或古代教会的牧师*（见：词汇浅释）。”

34. 这还有另一种方法指出了错误开始的原因，那就是折衷的方法试图去重建原始经文。经文评论家们经常按照折衷的理论去排斥拜占庭式因为它“出现的晚”，同时去偏爱亚历山大式。在众多反对的抄本当中，所有的抄本彼此之间都是相互支持的，他被迫在剩余的当中做出相应的选择——抄本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是同一水平的一个章节，一个句子也都有所不同。因为考虑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证据，在仔细地应用了他的混合规则之后，他又留下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缺乏大量的证据，而且并没有在任何现存的抄本中出现过。有了第一个主要的反对读物，他甚至又开始反对之前出现过的所有抄本，包括他自己最钟爱的亚历山大式！这就是被发现的现在折衷版本。

拜占庭优先理论的基础

35. 给出的拜占庭优先理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Hort 给出了最好的解释，通过他拥护的亚历山大式经文类别，而且是建立于众多反对拜占庭式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确定一个理论是否真实，要看现存的文件在历史传播的过程中，是否每一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原始文件所支持。换句话说，大多数文件所支持的一般要比少数文件支持的更有说服力。”（韦斯科特和霍特所著的《介绍》45 页[Westcott and Hort, *Introduction*, 45]见：参考书目）

36. 在非圣经的学术研究领域当中，这种说法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假设。假设一个正常的有意义的文本的传播是基于所有的手写文件传播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如果我们看一下非宗教的经典作家（荷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他幸存的

手稿当中。事实上，这些手稿中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别：较短的文字，较长的文字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字。

37. 抄本中包含了荷马的较短的文字，并告诉了我们“亚历山大式的鉴定技术和学术修订的方法。”（记住，亚历山大是那一时期的世界图书中心，它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这一短文本也被视为是亚历山大式的希腊新约圣经抄本：他们清晰的显示了经文在修订的过程中被压缩的这一编辑过程。

38. 较长的文字是作为反映流行的阐述和被抄写员改良的时候被标注出来的。在新约圣经当中，标注了荷马式抄本和粗糙的西方式抄本相似点。

39. 最后，打个比方，在边线之间的是球场。那么“中间的”和“公认的”经文究竟在哪，慢慢自然会被发现的。宗教的文本与非宗教的文本相比，优势就在于此。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那么答案将会有利于另一个结论，就是“正常的抄写行为和传播的连续性将保存大多数抄本‘不仅仅是一段原始文字，甚至还有一系列的原始文字’”

40. 拜占庭优先的位置作为一系列的突出的问题是经常被摒弃的。但是一个简单的机械计算远远不如这个位置的真正作为。事实上，有许多实例（特别是在约翰福音 7 章 53 节到 8 章 11 节和启示录当中）这些抄本当中的证据被分成了不止两种，甚至许多种变体经文；并没有一种主要的读物。那么突出问题的计数器又能说明什么呢？不，拜占庭优先理论并不是真的以此为特点的。

41. 或多或少有一些特定的原则导致了拜占庭优先的地位“反映了一个合理的传播主义思想，根据传播的可能性来评价内在的和外在的证据。”内部证据包括那些项目，被分析者摒弃了“内部概率指数”，也就是说，抄写员们看待的问题的答案，还有他可能完成的任何一种给定的情况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外部证据是抄本的证据，早期的传播和牧者的评论，所有被外界支持的有分量的读物。

42. 抄写员在抄写，改进经文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习惯，否则就会使经文变得有缺损。这种方法也承认了经文的类别真的受到了传播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讲，它强调了经文通过传播的历史基本上被保存的相当完整。

我们如何评价内部证据

43. 在拜占庭优先理论使用的原则和亚历山大折衷方法中间，存在着一组大量的重叠信息。然而，拜占庭的方法去除了一种折衷原则，也就是说，较短的经文被其所钟爱。然而，看起来像是拜占庭的观点强烈的抛弃了这一主要原则，以此来反对较短的亚历山大式（在整个希腊文新约圣经当中有两千多个单词不同，粗略地估算一下，在亚历山大式经文当中有 13 万 8 千多处，在拜占庭式经文当中有 14 万多处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被排斥的理由很简单，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抄写员在抄写过程中，在有意的去缩短经文的时候，要比武断故意填充经文时，犯更多的错误。近期广泛的对抄写员的习惯进行了研究，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可参见下面的原则 8）我们将先引用拜占庭优先理论公认的内部证据（下面缩写为 IE ‘内证’）原则。（这些原则用斜体字标出，是直接取自于罗宾逊[Robinson]。）

44. IE1. 人们通常更喜欢具有相似性的语言出现在同一读物当中，而不喜欢这些语言总是变来变去地被组合在一起出现。这一原则是两种思想学派都接受的。但不同的是：亚历山大的折衷主意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了每个孤立的变体当中。而拜占庭优先理论，从另一方面讲，不光要知道这些相互排斥的变体的出处，还要了解这些读物是什么时候被复制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45. 特别是，要注意下面的约翰福音 9 章 4 节的例子。现在折衷的批判经文，发现于 UBS 版希腊圣经，原文及翻译：“WE must work the works of the one having sent ME（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拜占庭式经文是：“I must work the works of the one having sent ME。（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么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组合都被支持 WE/ME（我们/我），I/ME（我/我），和 WE/US（我们/我们）：

- WE...ME = B 070;
- I...ME = Byz κ^a A C Θ Ψ f1 f13 33 lat syr;
- WE...US = P⁶⁶ P⁷⁵ κ^* L W bo;
- I...US –this combination is not attested.

“我们...我”的描述出现在了 B 和 070 版本中；

“我...我”的描述出现在了 Byz κ^a A C Θ Ψ f1 f13 33 lat syr 等版本当中；

“我们...我们”的描述出现在了 P⁶⁶ P⁷⁵ κ^* L W bo 等版本当中；

“我...我们”这种组合没有被证实。

这并不存在传播的逻辑，成千上万个见证——抄本，当中只有两个抄本存在这段经文（B 和 070），牧者们早期的翻译和评论，使之变为了另外的经文。拜占庭式（Byz）的经文（I...ME）更像是原始经文，而亚历山大式的抄写员把它变成了一段更积极的经文“我们/我们”（WE...US），然后在抄本 B 和 070 当中又胡乱地变成了让人质疑的“我们/我”（WE...ME）。

46. IE2. 人们更加偏爱抄写员创造出来的一段比较困难的文字。但真实的情况或许是这样的：通常抄写员不会放着原文中已有的简单的文字不用，而另辟蹊径去制造一段更加复杂的文字。这种情况偶尔是会发生的，这是不可否认的。考虑到经文整体传播的完整性，上面的原则在深思熟虑之后，应做出以下改进：当有大量的证据被广泛传播的时候，较困难的文字就会被钟爱，反之，当只有有限的单一证据或一些少数相关联的证据的时候，结论相反。

47. 这一原则在路加福音 6 章 1 节中被举例说明了，拜占庭文本读作 EN SABBATW DEUTEROPRWTW（“on the second-first Sabbath”译为：第一个之后的第二个安息日），在折衷的经文中读作 EN SABBATW（“on a Sabbath”译为：有一个安息日）。折衷派的经文中避开了比较难翻译的“second-first，”——至今为止它的意思没人能够确定，但是这一简单的词语不可能被平白无故地发明出来而不存在任何意义，或意外地制造出来。以下把“给传道人的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理念推到了一个局限的范围内，但如果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会使读者们受益颇多。

48. 布鲁斯·麦茨格（Bruce Metzger）的经文注释只能通过高度复杂的数据“解决”拜占庭式经文中存在的问题，这几乎没有任何的说服力：（1）“一个安息日”是原始的；（2）之后的抄写员看见了另一个安息日的描述在路加福音的 6 章 6 节，所以他选择了在“安息日”之前插入了“第一”；（3）第二个抄写员记得在前面第 4 章 31 节中提到了“安息日（复数）”应该与这节有关系，但是他把它看做了一个单数的来使用了，因此考虑到 4 章 31 节中的“第

一个”安息日，就在6章1节中写成了“第二个安息日”；(4)这个抄写员适当地在正文的边上加上了“第二个”，又在“第一个”前面加上了点，意思是想将它删掉；(5)根据这些，第三个抄写员适当地插入了“第二个”这个词，但他并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前面的点，这样便留下了这句毫无意义的经文 DEUTERW PRWTW (“on a second on a first” 译为：在第二个，在第一个)作为正文。(6)最后，第四个抄写员通过将两个词组合成为一个词——DEUTEROPRWTW，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样做不但改变了拼写的方法，同时也没有关心语句是否合乎逻辑（如果做了进一步的考虑，他或许至少会去掉 DEUTERW 和 PRWTW 中的一个，甚至两个都去掉）。(7)通过历史的传播，这一抄本就变成了所有现存抄本的母本，无论怎样去“还原”原稿，这段经文几乎没有被修正过，哪怕是没人明白“second-first”第二个第一是什么意思。

49. 问题当然在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事件链是否可能发生，即便真的是这样，不管是否由于传播的原因，每个人都有理由要求存在于一个单独的损坏的抄本中出现的这样极度困难的经文应该被修正，哪怕是这个抄本已经作为了一些其他抄本的母本。

50. 通过简单的比较，解决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管“second-first（第二个第一）”是什么意思，这个术语本身显然已经很困难了，而第二世纪中期，这个意思又变得不明确了。因此，直到它变得“更困难”之后，一些少数的抄写员（主要是埃及的和亚历山大式的经文拷贝）简单地将这个术语去除了（P4 ⚭ B L W f1 33 579 1241 2542 pc it sy-p, sy-hmg sa bo-pt）。

51. IE3. *原稿的作者更喜欢符合已知风格的经文，词汇和语法。*这是一个假设，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抄写员在抄写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改变了作者的风格和词汇，比刻意地去遵循它的可能性更大。不管怎样，这一原则被小心谨慎地使用着。例如，OUN“因此”是典型的约翰的风格。但是 DE“但是”比 OUN 在约翰福音中使用的更频繁。因此，当两个手稿当中分别出现 OUN 和 DE 的时候，这一原则没法告诉我们如何做出选择；两段经文中的任何一段都是典型的约翰福音。从历史传播的过程来考虑，当你读到其中一种中意抄本的时候，一定会给它加上更多的权重。

52. IE4. *不同版本中的读物明显的一致，或是用一段文章中的文字去适应另一段文章都是不对的。*当协调的文字在被拷贝的过程中频繁出现，那么它就是过分的强调了。折衷地位的支持者们很快地将拜占庭式经文贴上了“明显是故意协调”的标签；他们假设了，抄写员们在抄写拜占庭式经文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个常规的习惯性的调整。但是为什么只有拜占庭式的抄写员做了调整呢？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抄写员的习惯，那么无论多么通顺的抄本，抄写员们都保留着这一习惯吗？这种理论恐怕是不能被接受的。事实上，真正的对文章进行调整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只有零星的一些情况出现。此外，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有很多逐字逐句的例子可以拿出来进行对比，没有哪一段经文是存疑的。所以，为什么当出现了一种变体，经过与福音书当中的另一处经文对比之后，就认定了它是来自于抄写员的改动，而不是来自于作者本身呢？重申一下，*经文注脚*告诉给我们不管是修改，还是单纯的相同，都不会发生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的。这又一次证明了传播的历史是应被考虑进去的，因为所有的案例都有被修改的可能。

53. IE5. *经文可以被看作是抄写员虔诚的映射，也可以被看作是抄写员们因为虔诚，而再一次（“再一次”的意思是经文本身并不是出于原始抄本，而是被抄写员们创造出来的）对经*

文进行了有目的的阐述和修改。这种形式的变体，是单纯地去挑选了一段比较短的经文来作为原始经文，并将其他的都称做具有宗教意义的扩展。就哥林多前书 5 章 5 节而言，来举个例子，拜占庭式的经文读作“the day of THE LORD JESUS 译为：主耶稣的日子”；这段经文被许多拜占庭式的抄本所支持，也被亚历山大式的 codex 版本所支持。然而，折衷的经文却选择了一个较短的表达方式：“the day of THE LORD 译为：主的日子”；这段经文被发现于亚历山大式的抄本 P46 和 B 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抄本当中也有。这段经文最完整的表达是“the da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译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段长的经文（不论有没有“OUR——我们”）被发现于安色尔体 A⁺ 写成的一些少数抄本当中。所有的抄写都清晰地指向了拜占庭式的经文，因为其他的经文都是由这句“主耶稣的日子”衍生出来的。拜占庭式的经文批评者们指责它“扩充了经文，从而反映出抄写员们的虔诚”；但是这些批评者们应该解释为什么拜占庭式的哥林多前书 5 章 5 节包含了一个中间的形式（“the day of THE LORD JESUS 译为：主耶稣的日子”）——为什么拜占庭式的抄写员们没有把它扩充为“OUR LORD JESUS CHRIST 译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事实上，有无数的“长形式”的神圣的名词贯穿了希腊文新约圣经，而且展示给了我们没有任何的明显变化；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原创的。

54. IE6. 经文的主要评价应该建立在抄写的可能性的基础上的。这一原则应该从 1881 年首部折衷版希腊新约圣经的发行者韦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和 Hort）开始追溯，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产生了差异。简单地说，一个单一的错误或者故意的修改是不会大量地被永久保存的，通常会随着包含他们的抄本一起消逝，或者最多存在于极少数的一些抄本当中。这就证明了，大多数的故意修改或由于疏忽导致的错误，是不会被后来的抄写员在抄写不同的经文的时候合并或延续使用的。

55. IE7. 抄写错误比故意修改更像是许多明显变体的最终源头。许多不同的经文是抄写错误导致的结果。一方面，这其中包括所有的纯粹的废话，也有许多经文中明显的出现了漏掉一个字母、音节或一个词。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些漏写、重复抄写、串行以及一些其他的类似错误。

56. 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我们应该在假设一种变体读物是故意修改之前，为它找出一个相应的副本的解释。

57. IE8. 不论是较短的经文或是较长的经文都是不应该享有优先权的。折衷经文批评家们的假设是抄写员们有着强烈的扩充倾向，不管是以神圣的名义还是为了将不同的故事组合在一起。而且抄写员的习惯被当成现存资料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这一假设。他们的习惯真的是这样吗？神圣的主题应该被更频繁地扩展，相同的段落应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异文合并应该有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折衷主义批评者们的假设，这一主要工作，被钟爱亚历山大式经文的一个假设推翻了。与此同时，较长的经文享有了优先权，而对西方式经文的钟爱也同样没有得到支持。

我们如何评价外部证据

58. 拜占庭优先的方法并不是要考虑有多少个抄本支持了一段给出的经文，而是要考虑这些经文怎样通过一段扩展的文字相互影响（这就包含了应该把“传播的注意事项”列在考虑的范围内）。每一段经文的顺序都被大量的合理的抄本所支持，这就暗示了传播的一致性。经

文如果缺乏传播的连贯性那么它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而且相关的顺序不可能反映出部分手稿中经文的原始形式。现在我们来看看外部证据（简称：外证 EE）的一些相关的原则。

59. EE1. *大量新约圣经经文保存的证据排除了一种推测（猜测校正[见：词汇浅释]），就是假设书写出来的文本是一个错误的文本。只有假设原始经文中的话语在现存的证据（抄本，译本，牧师的评注）中彻底地消失，才可以证明猜测校正是合理的。直到新约圣经跟远古时代其他的手抄著作相比，被更广泛地证实，当这样的一种文本被建立起来以后，没有任何证据为这样一种方法辩护。*

60. EE2. *在历史传播的过程中，只有零星的经文是被质疑的。根（原稿）会生出枝叶（传播的结果）来。这是正常文字传播的方法。在他们生长和传播的过程中，由抄写衍生出来的后代都深深地反映了原稿。*

- a. *如果一段经文只保存在一个抄本之中，那么无论是早期的翻译还是牧师的评注都是值得质疑的。相信整个抄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一部分已经偏离了原始经文。*
- b. *如果一些经文只保存在一少部分抄本中，那么也是值得质疑的。越少包含给出经文的版本，越值得怀疑，因为它已不具备原始经文的意义了。即使这段经文出现在一些相似格式的抄本或版本当中，它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只要这些抄本或版本的数量比广泛传播的数量少。*

61. EE3. *不同的见证更应该被我们关注。换句话说，如果在不同的资源当中找到相同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会比只出现在一种资源当中的经文更像是原始经文。这一原则分为两部分，无论哪一部分自己都不能单独建立一个文本，同时也没有哪一部分可以独立支持一段给出的经文。*

- a. *一段经文被不同的早期翻译，牧师的评注和更多元化的资料所支持，另一段经文缺乏这些支持。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获得支持更多的，才更好。但这并不足以单独建立一个文本。除非这段经文可以在希腊抄本当中找到证据，其他都是次要的。*
- b. *在众多的希腊抄本当中，一段经文如果发现于不同版本的抄本当中，要比发现于小范围或一个单独版本中的经文更具说服力。拜占庭式经文的优势就在于频繁地出现在这一原则当中：即，有更多的情况是一段经文，既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式经文当中，又出现在了拜占庭式经文当中。或是，既出现在西方式经文当中，又出现在拜占庭式经文当中。而并不是，一段经文只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式或西方式经文当中，没有出现在拜占庭式经文当中。*

62. EE4. *无论哪种可能，不成熟的抄本的数量都应该被明智地减少。尽可能地在一些抄本中找到相应的关系。以计算为目的，每一个组别或一个族都应该被作为一个单位来计算。但是为了方便计算，根据系统学，将整个一个假定的版本看作一个单位（作为拜占庭式经文的对立者们，更愿意这样去假设），当处理其他版式抄本的时候，将这一点作为有价值的个别证据，这是不合理的。*

63. *这种建立在传播因素之上的，假设的最初经文类别，被称为“原始文本形式”，例如，原始初稿中有确切的经文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所有的经文类别都是由这种文本形式衍生出来*

的。在此基础上，只有拜占庭式经文才真的称得上“原始文本形式”。所有其他与之相矛盾的文本形式都反射出了“经文类别”或是“子类型经文”或是“抄本的族”，这些中的每一种最终又都发展并传播出了另一种单独的原始文本形式。

64. EE5. 抄本还需要被“衡量权重”，而并不仅仅是被计算数量。虽然上面提到的外证 4 是真实的，但所有的抄本任然需要依据他们的文本鉴定价值或“权重”来分类。基础的“权重”可信度高的抄本或许是临摹出来的。例如，一个迟一点的抄本或许保存了更早期的文本形式；一个复制得很好的抄本或许保存了一个稍差些的文本形式；一个复制得不好的抄本或许保存了一个某方面很出众的文本形式。因此，一个抄写员习惯的检测变得非常重要。一个抄写员如果具有漏写单词或短语的习惯（漏写），那么无论在原始文稿当中是包含了还是省略了一个带有疑问的单词，词组或是章节，对于判定来讲都是没有价值的，哪怕是这个抄写员在处理其他种类的变化关系上（比如替换或者调换）更加精确。虽然这一原则已经附加了这么重要的历史因素，但是关于个别抄写员习惯的评价也只完成了相当少的一部分。往往，这一原则单独被引用到败坏拜占庭式经文的文本形式当中，也仅此而已。

65. EE6. 找出可论证的早期经文是很重要的。抄本的年代并不像抄本中被抄写的文字的年代那么有意义。记住，文字的年代总是比记载它的抄本的年代要久远——毕竟，抄写员的工作是复制一个古老的抄本，从而制造出一个新的抄本——所以抄本中文字的年代至少同文字中发现的经文一样久远。同样，为一段带有现存证据的特定经文找出最早的已知证明也是很重要的。当一段给出的经文没有早期的证据支持的时候，这段经文也是不可信的；然而，仅仅因为一段经文能够被标注上一个“较早”的日期，并不能以这一单独的事实为依据，来判断它是否是“原始”经文。

66. 如何确定什么是“早”，什么是“迟”呢？在 19 世纪，韦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和 Hort）管一些经文叫做第二时期（比如，非原始经文）经文或迟的经文。但是，一些抄本直到韦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和 Hort）的时期才被发现——特别是发现在一些埃及的蒲草纸当中——证明了许多“迟”的经文都出现得非常早。它现在也被大部分接受，虽然不是全部，明显的经文非常像公元 200 年以前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当心，不能只因为一段经文出现在比较迟的抄本当中，就声称这段给出的经文缺乏历史性。

67. 它被知道并接受在一些比较“迟”的抄本当中——甚至一些抄本被制造于小楷体时代，这种形式开始于第九世纪——保存了早期的非拜占庭式经文或非拜占庭式的文本形式。假设一些小楷体抄本包含一种拜占庭式的文本形式，或许也反映出了一种简单的早期特点，难道这不合理吗？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需要试问一下我们应该把分界线画在哪呢？有合理的理由来考虑所有包含“早期”经文的“早期”文本形式的抄本都延伸到了十世纪末期或十一世纪初期。

68. 这怎么可能呢？下面的段落解释了这个问题。新约圣经文本传播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转变（我们称之为“拷贝革命”）或许可以对事实作出解释，那就是迟些的抄本反映了太多古老的文本。在这两点上，许多古代抄本被大量的重新抄写，并代替了他们的原始抄本。

69. 第一种，发生在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通召》使基督教合法化。一夜之间，教会便从一个受破坏的少数派变成为一个政府保护下的被认可的个体了。并非偶然，与此同时，书写材料也发生了变化，从比较廉价、易坏的蒲草纸变成了比较昂贵、耐用的牛

皮纸（前面提到过）。突然之间，人们对牛皮纸的圣经有了新的需求。这也导致了狂热的拷贝活动。很可能一些教会用昂贵的牛皮纸仔细地抄写了新约圣经抄本，并恭敬地摧毁了旧的易坏蒲草纸抄本。

70. 第一种拷贝革命的重要意义是：有一些安色尔体的抄本存在着十分相似的经文，这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是出自于同一个祖先：E, F, G 和 H 包含着一组这样紧密相关的安色尔体，另一组这样的集合来自于 S, U, V 和 Ω 。也有一些相关联的独立的安色尔体抄本被制造于 9 世纪。很可能所有的这些安色尔体都抄自于早期的蒲草纸抄本。如果你不怀疑安色尔体 Aleph($\aleph$)和 B 是抄自于早期的蒲草纸抄本（ $\aleph$ 和 B 是两种被今天的折衷经文评论者们所高度钟爱的古老的安色尔体抄本），那么你就更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想还原新约圣经的原始经文的时候，所有的牛皮纸安色尔体都应该可以被应用。

71. 第二种拷贝革命发生在 9 世纪（公元 800 年—900 年），当手写体从安色尔体迅速地转变成小楷的时候。连续存在于新约圣经抄本当中的安色尔体，在使用了 150 年之后停止了。第二种拷贝革命的影响与第一种相似：在跨越了短短的一些年之后，更早一段时间的安色尔抄本被一种新的流行字体所代替，并消亡。这一发展，将一种学习的复兴带入了拜占庭的世界里，致使学者们通过追溯更古老的抄本去寻找一种更好的文本。这一事实的发生已经通过带有公认的“早期”（通常是亚历山大式）的文本类型的不同的真实存在的小楷抄本得到了证实。

72. EEP7. 一个单一的“最好的”抄本或“最好的”一组抄本的概念是不太可能存在对其有利的传播证据的。一些较差的抄本可能包含“好的”经文，而一些仔细抄写的抄本可能包含差的经文。在各种不同的经文类型当中，一些抄本将比其他的抄本更具代表性。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传播的考虑是倾向于去除这样的观念，一个单一的抄本或是一组抄本占据了一个优越的地位。这个原则是有效的，哪怕是对一些支持拜占庭文本形式的抄本也一样。没有哪个抄本可以被认为是最好的。

73. EEP8. 这一概念我们应该信赖，在传播因素的基础上讲，单独依靠最古老的抄本或证人是存在缺陷的。“最古老”的就是“最好的”，这是多么荒谬的原则啊，因为之后的抄本保存的经文或许比早期的见证人更古老。

74. EEP9. 传播的因素加上内在的原则指出了拜占庭式文本形式在传播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在分析之前，拜占庭文本形式，没有被宣称要成为原始经文形式，甚至没有想成为出众的经文类别。下面的结论，只作为内在和外因素关于传播的可能性的逻辑上的推论，被视为与其他古老的远古作品在传播上相平行的历史框架。

75. 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优先的假设也对下面的情况无能为力，比如说：外部证据是从哪划分的，有的地方没有明显经文所支持[传播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原则附加的传播的可能性又被唤起去决定最有力的经文。同样地，在许多情况下，内部原则提供不了清晰的决策，外部原则就必须承担起主导的地位。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手抄本被划分的同时内在证据是没有决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学术性的判断是最受期待的。[顺便提一下，原始文本的经文是很难下判断的，几乎所有的细枝末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影响新约圣经文本的基本完整性，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

76. “平衡内在和外在证据的基本规则是很简单的，按照我们已知的抄写员的习惯顺序：（1）任何人都应该按照发展的目的去评价经文[抄写的过程可能会造成意外的变化]；（2）应该考虑到经文中有可能存在故意修改的因素；最后，[比较不同经文的单位]评价经文的过程中，应该从传播历史的因素去确认和修改，从而做出初步评价。严格地遵循这一方法，将在有效的传播基础上，建立有理有据的正确的结论。考虑了传播的过程后，我们通过学习发现的抄写的习惯和现存的抄本的证据，应该被认同了。”

一些反对拜占庭优先理论的解决方法

77. 这一想法的详细阐述潜在地支持了拜占庭文本形式，并且其在传播优先理论上的强烈争议超过了其他的文本形式。然而，有一些拜占庭优先理论的反对意见（OBJ）应该被讨论。

78. OBJ1. 没有早期的拜占庭抄本先于4世纪之前。对这一反对意见出现过一些回应，这些回应联合起来造成了很大的反响。

a. 对于古典的作品，通常被标注“当没有什么能够准确地表示不同的文字类型的原始比例的时候，可能会有现存的副本存在。”[鲍尔斯（Bowers），参考书目，第75页]为什么圣经也会这样呢？不但在第4世纪之前没有对拜占庭文本形式的支持：这个时代的亚历山大式文本形式的支持抄本也只有63份蒲草纸的抄本，而这些当中的许多也都是不完整的。后期的，5000份抄本当中的大多数是适用于重建原始经文的。

b. 上面提到的两种拷贝革命严重地破坏了传播的连贯性。第一次革命（第4世纪）先前存在的蒲草纸抄本都被破坏或被丢弃了。同样的，第二次革命，需要被保留的安色尔体抄本又被有效地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小楷体副本被制造出来。由于年代、材料或是版本的原因，没有抄本很好地流传下来，特别是当早期的小楷体出现，并延续了现在丢失的安色尔体，而安色尔体本身又源自于早期的蒲草纸。事实上，早于4世纪初期的拜占庭抄本应该被认为是

c. 在埃及当地发现的经文形式应该被深思熟虑。它利用想象去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最初的4个世纪里，埃及的亚历山大式经文在主要的希腊语国家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后几乎全部消失了。另一方面，它更容易地维护了拜占庭式抄本，并且在后面的时代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从而贯穿了整个拜占庭帝国。但是一些早期的抄本，由于埃及本身的沙漠化的气候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d. 大多数现在折衷主义思想似乎在那些地区呈现出了一种非拜占庭文本的优势，而后来却变成了拜占庭式的重要支持。在同一地区，不同的是，拜占庭的拥护者们将这一变化作为了强有力的证据。按照文本传播的地理因素考虑，越是接近源头的文本，就越容易被保存的完整。如果对某段文字存在疑问，那么我们在这段文字的发源地附近，从众多资料当中，找出含有原始文字的资料是很容易的，但是随着距离的增长，这样的做法就会变得越来越难。随着距离的增加，完整性会缺失，因为随着不断的传播，很可能带来局部的变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地理因素沉默”的这一时期，以希腊语为主的地区将被期待保留一段更纯粹的经文——从这一地区开始传播的新约圣经的原始文稿，无论是否源于那一地区的个别的原文作者或收件人，这些文稿都应该是在该地区被妥善保存的，尽管是在那样的年代——然后在这一地区一经发现固有的证据，这些文稿本身就会体现出它自身明显的价值。这样的文本

就是拜占庭式文本。

e. 以此类推到福类福音书的资源理论上，正如所谓的 Q 文件（意思是‘源文件’）之备受争议，尽管没有一点残存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是出自于真理，那么，与之相似的 4 世纪初期存在的拜占庭文本形式为什么就应该被同一批学者们坚定地否认呢？尽管它存在的证据远比 Q 文件要充分得多。假设和偏差是不容易被消灭的。

f. 梵蒂冈古抄本包含了亚历山大文本并可追溯到 4 世纪。之前与 1955 年发现的 3 世纪的蒲草纸，没有确切的证明 4 世纪之前亚历山大文本的存在。然而，正因为这样。同样的，拜占庭原始文本的反对者们也不能排除 2 世纪或 3 世纪拜占庭抄本在埃及人手中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发现将会层出不穷，可能仍会从亚历山大基础文本的评论家们那里得到正常而期待的反应，正因为包容，喜欢拜占庭胜过其他早期文本的人，并没有成为拜占庭文本的膜拜者。

79. OBJ2. 在历史的流传当中，拜占庭文本的主要破坏排除了外人所为。一般认为的两次破坏是戴克里先皇帝统治下的迫害和自 7 世纪之后的穆斯林的入侵。虽然这两次破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是不可能单单挑出非拜占庭文本进行销毁，而拜占庭文本毫发无损。那两次破坏圣经的人，在决定点火之前根本不会问是什么版本的。因此，可以预计，抄本幸存下来的比例要比迫害之前的少。

80. OBJ3. 约翰·屈梭多模（公元 347 年——公元 407 年）的影响或其他教会领袖使拜占庭式文本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优先文本；之后，这一文本被帝王或教会的法令强加给了东方的希腊教会。一个单独的牧师能够引入一段新的或是局部的经文，使其流行并具有影响力，是不合理的（拜占庭式的批评者们这么做了），因此，导致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文本（这里假设是亚历山大式文本）被抛弃了。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不同经文基础的强制实行是有帝王或教会的法令颁布的。即使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也很难想象一个从前占主导地位的文本被整体更换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当法令本身是虚构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此外，拜占庭式文本证明了内部差异，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些独立的体系所组成的，一个事实是不能被单一事件更换理论简单解释的。

81. OBJ4. 拜占庭式文本是一个加工的结果，通过了几个世纪，为了圆滑、和谐、文法通顺和一些其他的“改进”，从原始文本形式稳固的变化而得来的。支持者们给出了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意见：（1）抄写员们不会像是被电脑控制了一样，机械抄写得准确无误，（2）只有当人为的“控制”产生的时候，一些抄本之间才会接近一致。

82.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恰恰相反，已经得到证实罗伊斯·科威尔·海德（Royse, Colwell, Head）的是，大多数抄写员在抄写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着细致和精确。

83. 关于第二点：没有证据表明拜占庭文本形式的抄本是被“控制”或外在力量使其强行一致的。Hodges 已经用一段经典的陈述排除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加工”这一反对意见：“没有人能够解释，缓慢的加工一种文本形式，并使之流传至许多世纪，且遍布广泛的地域，是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同时，大部分的抄写员他们甚至不了解他们的教会和缮写室中的经文之外的任何事物，那么早期的文本形式（西方式和亚历山大式）是否还应该质疑，在这种文本形式（拜占庭式）当中能够达成没有差异并广泛的一致……一个不受控制的过程能够在多个文本、历史因素和文化范畴内，在新约圣经被抄写的时候，达到相对的稳定和一致，这

是我们没法想象的。”(霍奇斯和霍奇斯所著的《意义》第 132 页[Hodges 和 Hodges, Implications, 132])

总结和结论

84. 在前面的段落当中，我们尝试着用技术方法来做讨论，为拜占庭优先理论奠定了基础。作为简短的总结，在作者看来，这一方法是具有决定性的，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

85. 首先，拜占庭优先理论只是像它的名字一样：仅仅是一个理论。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资料，也有义务对资料做出解释。在现在的折衷主义思想当中——其他的主要方法对文本考证（尽管有一些学院派沿用这种方法）来讲——没有任何的方法，而更多的是推测。拜占庭优先理论是可以通过数据测试的，并且是经得起推敲的。至少我们还有一个理论。在折衷主义的方法当中，尽管这些资料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但它似乎是不可能从数据转换成理论的。因此，拜占庭优先理论与折衷主义思想相比，距离理论的标准更近一些。

86. 其次，这一方法当中包含着经文。对语言本身来讲，无论是作为听者或读者，我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些原文的本意。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文本自身是有它传播的历史的，它是通过记录或记忆的形式被流传下来的。如果不带着传播的历史去考量一个文本最好的结果是令人沮丧，最坏的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现存的希腊新约圣经抄本是原始文本的副本。除了一少部分处在“边缘”的抄本之外，大多数副本包含的经文都显然是非常一致的。这一刻我们知道，这个文本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但它以这种方式忍耐了很多个漫长的世纪，可喜的是无论哪个年代，哪个世纪，依然有教会保留着这种文本，大多数人还清晰地知道这一文本仍然占有主导地位——拜占庭式文本。

87. 注：作者考虑到所有引用的材料对传道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改变的和带有方括号的‘[]’），同时对读者的理解也会起到好的效果。

提摩太·弗里伯格，博士（Timothy Friberg, PhD）

2011 年 1 月

这个传道人的指南已经被很多的学者纠正过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存着喜欢它的目的——传道人们经过了五年的修正。在这里我要感谢太多人，有 30 位左右在这篇文章中做出了贡献，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减少我对他们的感谢。这里我只提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迈克尔·马丁斯（Michael Martens）作为一名忠实的、有深刻见解的编辑一直在很多经文版本方面（在英语和印尼语两方面），从这一观点提出的开始，就一直支持着我。正如我试图澄清拜占庭优先理论时，迈克尔（Michael）帮助我度过了这一难关。谢谢你，迈克尔（Michael）。

词汇浅释：

1. 经文注脚：一组注解，通常在文本页面的下面，在手抄本里就有，用这种简洁的形式给读者足够的信息来权衡圣经的真谛。例如在 UBS4r 和 N-A27 这两本希腊文新约圣经里就有经文注脚。在由皮尔邦德（Pierpont）和罗宾逊（Robinson）整编的拜占庭式抄本，和由霍奇斯（Hodges）与法斯塔德（Farstad）整编的多数人抄本中也有经文注脚。

2. 原稿：字面的意思是由某人亲手写的稿件。这里我们指的是原始的手抄本，没有被别人抄写过的。

3. 正典：原来指一根芦苇或量度用的棒子。现指 1 被神的子民所接受的权威的新约圣经。2 是标准的同义词，它既指圣经经文本身所必须符合的标准，又指人可以把他们的生活与圣经所要求的作比较。

4. 古抄本：又称翻页书，是把一张或几张蒲草纸对折，中间用针缝起来。（对于单张纸或卷轴来说这是一个革新。）

5. 异文合并：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发现的不同手抄本里的经文，混合成另外一个抄本。比如，A 版本抄本里的经文是这样写的“他走进房间”；B 版本是“他坐在房间里”；综合后的 C 版本是“他走进房间并坐了下来”；C 版本就是 A 和 B 的合成本。

6. 猜测校正：在校正一种圣经版本的时候，没有在备用文本里进行选择，而是加入了学者自己的猜测，而这种猜测没有依据。

7. 草书抄本：1. 草书是手写体的一种，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2. 这是一种以草书为主的抄本，当提及到新约圣经抄本的时候可以与“小楷体抄本”互换。

8. 由于误写而重复的字母或字：原本应该写一次的一个字母、几个字母、一个词或一句话，被错误的写成了两次或几次。

9. 折衷的：1. 在几个被选资料里选择最好的，从不同的原始资料当中提取组成的要素，每一个文本的变体都是由它自身的价值决定的。2 折中主义者：在工作当中使用折中方法的人。

10. 样本：一种作为源文本的抄本，照着它来抄写新的抄本。

11. 现存的：现今存在的，没有被毁坏或丢失的。

12. 外在证据：证据来自于抄本，早期的翻译和教父的评论决定了哪种读本是最受外界支持的。（比较 下面的内在证据）

13. 漏写：1. 在写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时候，应该写两遍而只写了一遍。2. 因句首或句尾相似而出现不应该出现的省略。

14. 跳读：抄写错误，因抄写员在抄写过程中省略了句首相似的词或句子，致使这类文本比样本抄本缺失。

15 跳读：抄写错误，因抄写员在抄写过程中省略了句尾相似的词或句子，致使这类文本比样本抄写缺失。

16. 内在证据：这些证据给分析员们一定程度的概率分析，回答有关原作者或复制抄写员可能会写下来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情况，有意或无意写的。（比较 上面的外在证据）

17. 灯碳黑：黑色粉末状的烟灰，通常是从灯罩灯里取出来当颜料用，用它制作不同的墨汁。

18. 经课集：教会年历选辑的新约（启示录除外）经文摘录。经文摘录是供主日敬拜或个人灵修之用，是由新约抄本的部分内容组成的。

19. 抄本：（通常单数缩写是 *ms*,复数缩写是 *mss*）[“抄本”和“经文”在单词的本意上是有区别的，但我们在“词汇浅释”或“本文”中提到的这两个词在某些方面的含义是有重复的] 1. 严格地说，是写于书写材料（蒲草纸或上等皮纸，视情况而定）上的带有信息的文字。可以被持有，检查，阅读，拷贝，存储，消耗，遗失或毁坏；2. 基于某种特别的文稿之上的不同种类的特殊写作形式，有时会伴随着抄本一词出现，并代替了抄本一词的意思去理解。例如：草书（写作抄本），安色尔体（写作抄本），小楷（写作抄本）；3. 构成文稿的写作材料的种类，有时伴会伴随着抄本一词出现，并代替了抄本一词的意思去理解。例如：蒲草纸（抄本），上等皮纸（抄本），羊皮纸（抄本）。

20. 小楷体抄本：1. 由草书发展而来的一种更正式的手写体，它比之前的字体简单小巧。2. 抄本是由手写制成的，尤其是当我们提到新约抄本的时候，通常使用的都是“草书”。

21 蒲草纸：（复数 *papyri* 或 *papyruses*）1.生长在沼泽里的一种植物，尤其生长在尼罗河谷。2.由植物制成的书写材料，可制成单张纸张，也可制成卷轴。3.用来书写的材料。

22. 羊皮纸：1.动物的皮，通常是绵羊皮或山羊皮，用来做书写的材料 2.通常都写在羊皮上面。

23 古代教会的牧师：与早期教堂的神父很像，是被牧师们所评述的

24. 校订：基于对原始资料的认真检阅而对一个版本的修订。一个版本的确定是需要认真校订的。校订的（*recensional*）：是关于校订的。

25. 合理的传播主义思想：试着通过衡量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去决定原稿形式的一种尝试，并确认经文传播具有一定历史的这一事实。

26. 缮写室：（复数 *scriptoria*）中世纪的修道院为抄写员留出用来抄写圣经的房间。

27. 流传的经文：从众多抄本当中流传下来的共同的一部分经文，这个流量可小可大，可以像一条小溪也可以像一条河流，但都会包含部分抄本当中的信息。

28. 符类福音书：指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因为它们包含了类似的材料和相同的观点来看耶稣的事迹，约翰福音则主要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

29. 文本：（不同于“抄本”，它是通过物理媒介[纸，墨和字母]传播的文稿；在抄本和文本之间有很多重叠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本文中，给出了一些注释）1. 新约圣经中的信息，它包含了特殊的希腊单词的拼写，语调和顺序；2. 那些包含了最初作者所写的原始抄

本中的信息；3. 因为包含原始信息的原始抄本现在已经遗失了，我们将通过对现存的变体经文进行比较，来试着重现的原始抄本；4. 它是我们通过对不同的抄本之间进行比较，来努力重现原始文稿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将会继续，所以这一文稿的意义将永不终结；5. 发现于模板抄本之中，被抄写员抄写，或被另一个抄本所转录了；6. 发现于一个给出的抄本当中，供专业的抄写员阅读，检查，揣测，以便于誊写到另一个空白的抄本当中（实际上，这一条跟第五条基本相同。第五条是指过去的时间，第六条是指现在的时间）。可以涵盖一个单独的词，词组，以至于整个抄本，都是通过其内容的阅读，比较，以及重建来完成的；7. 被原稿所接受的，通过经文考证我们试图证明的。学者们将针对不同的观点，用不同的语言，对文本一词进行描述，因此文本一词都具有他自身独特的含义；8. 对“文本类别”一种简短的描述，例如，包含特殊特点的一组抄本；比如说，西方式经文，凯撒式经文；9. 我们手中保留的，一本装订好的书，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无论是原始的还是重建的。

30. 文本形式：1. 文本的形式最频繁的出现是用来反映原始读物的；2. 最早传播的文本形式，就等同于原稿；在原则上讲，任何一种经文类别的拥护者都有可能声称自己拥护的更接近原稿，通常是这样的，然而，拜占庭经文类别的拥护者们是用术语来说明的。

31. 经文类别（版本）：每一组抄本的经文都体现出了一些其独有的特征；通常认为存在四种主要的经文类型：亚历山大式，拜占庭式，凯撒式和西方式；他们通常被与经文互换，例如：西方经文或西方经文类别，所以叫西方式。

32. 文本考证：试图证明初始文稿当中的一段文字是来自于不同的抄本当中的。

33. 公认经文：拉丁文中译为“收到的经文”（简写为：TR）。普通经文应追溯到 16 世纪 00 年代的早期，希腊新约圣经的第一次印刷，和被伊拉莫斯首次出版，后又经历了各种版本及修订本。公认经文只建立在希腊抄本的基础之上，尽管它经常出现在拜占庭式经文类别当中，但它与大量的主流拜占庭式经文的资料是不同的。詹姆斯王翻译的经文是建立在公认经文基础之上的。拜占庭优先主义的拥护者不应该与提倡“公认经文”和“詹姆斯王译本”的人们相提并论。

34. 安色尔字体（抄本）：1. 一种手写体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写字母组成，有时略圆，近草书。2. 一种以这样的文字写成的抄本。

35. 变体经文：为了被阅读而书写而成的；无论是一个单独的词或是一整篇文章都有它本身的含义；当两个或更多的抄本给出的证据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了争议，这时候，经文就显现出了他特有的价值；其目的是为了重现原稿，这样一来其他的经文就都成了变体；学者们对重现原稿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文都充当着另外一个的变体，从而去争夺原稿的地位。成千上万种抄本当中才含有一个特别的段落，只有那么两三个变体经文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几乎不超过十；94%的新约圣经经文显示的是没有不同的；无论什么经文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文本；从另一方面来看，亚历山大式文本和拜占庭式文本有着近 6000 处的不同。

36. 上等皮纸：1. 一种有细纹理、无裂口的羊皮、山羊皮或小牛皮，通常用于书写；
2. 通常用这种材料作为最终稿件的材料。

37. 版本：通常是一种早期希腊文新约圣经的翻译，无论是科普特语、叙利亚语、歌特语、拉丁语等等；版本的：是与版本相关联的。

参考书目：

Bowers, Fredson.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1964. (由弗莱德森·鲍尔斯所著的，牛津大学：克拉兰顿，1964年出版的《参考书目和文本考证》)

Greenlee, J. Harold.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Revised edition. Grand Rapid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1. (由约伯·哈罗德·格林李所著的，大急流城：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介绍新约圣经文本考证》修订版)

Hodges, Zane C. and David M. Hodges.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istical Probabilit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ext," Appendix C in Wilbur N. Pickering,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Text II*, third edition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3). (由约翰 C. 霍奇斯和大卫 M. 霍奇斯提出的“统计概率对经文历史的意义”，在威尔伯 C. 皮克林所著的，尤金 OR：威迫夫和斯托克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新约圣经经文的一致性 II》第三版)

Pierpont, William G. and Maurice A. Robinson, editors. "Preface" to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Byzantine Textform*, 2005. Southborough, Massachusetts: Chilton Book Publishing, 2005. (威廉 G. 皮尔蓬和莫里斯 A. 罗宾逊为《原始希腊语的新约圣经：拜占庭文本形式，2005》所编辑的“前言”。马萨诸塞州，索思伯勒：克林顿图书出版社，2005年)

Robinson, Maurice A. "Appendix: The case for Byzantine prior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Byzantine Textform*, 2005. Southborough, Massachusetts: Chilton Book Publishing, 2005. (莫里斯 A. 罗宾逊所著的《原始希腊语的新约圣经：拜占庭文本形式，2005》“附录：拜占庭优先理论的实例”。马萨诸塞州，索思伯勒：克林顿图书出版社，2005年)

Robinson, Maurice A. "Rule 9, isolated variants, and the 'test-tube' nature of the NA27/UBS4 Text: a Byzantine-priority perspective." In Stanley Porter and Mark Boda, editors, *From Text to Translati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ingham Colloquium*, 2005. Grand Rapids: Eerdmans, forthcoming. (莫里斯 A. 罗宾逊“规则 9，独立变体，NA27 或 UBS4 版圣经经文的‘试管’本性：一个拜占庭优先的观点。”由斯坦利·波特和马可·博大所编辑的《从经文到翻译：宾厄姆讨论会的进程，2005》大急流城：时报，即将出版。)

Westcott, B.F. and F. J. A. 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With Notes on Selected Reading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reprinted edition 1988 [1882]. (B.F. 韦斯科特和 F.J.A. 霍特所著的《原始希腊语的新约圣经介绍：所选经文中带有标记》。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 1988 年再版，原版于 1882 年)